

于 群 主编

美国国家安全 与冷战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于 群 主编

美国国家安全 与冷战战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国家安全与冷战战略/于群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

ISBN 7-5004-5661-1

I . 美 … II . 于 … III . 冷战—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 D871. 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5407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3. 625 插 页 2

字 数 340 千字

定 价 30.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2002年9月20日，美国白宫公布了布什总统上台以来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报告正式提出向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发动主动进攻的“先发制人”战略。有评论认为：布什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标志着美国彻底改变了冷战时期奉行的“威慑”与“遏制”战略，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质的转变。这一新政策的出台不仅使世界聚焦美国的现实战略选择，而且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整个冷战时期历届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制定的种种冷战战略，进而获取现今美国政府战略决策的相关信息。《美国国家安全与冷战战略》一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考虑，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师生们数年之心力，敝缕竭虑，拓荒而来的。

—

无论是一篇论文还是一部著作，若想在当今史林浩繁的卷帙中独树一家之言，且历久而弥坚，必然跃不出两种途径：一

是守拙，一是创新。守拙即老老实实地遵守史学研究者的本分，头悬梁锥刺骨，练好伏案工夫，从史料中还原历史，以史料为依据解读历史；创新则需要在丰厚的知识积淀和较深理论修养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引入新的史学研究元素，进而提出可以引发新思考的新观点。本书值得着墨的地方在于其在选题、观点、文献三个方面都有推陈出“新”之处，而正是这些特点使本书成为当前日益兴起的中国“新冷战史学”研究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一词的界定在二战后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这同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有关，但更多的是作为冷战的结果出现的。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那篇举世瞩目的外交咨文，借制定对希腊援助政策之机将一个全新的美国国家安全观念公之于众。在咨文中，杜鲁门将希腊问题以及所有“中间地带”问题推而广之为“自由与专制”的斗争，这无疑为冷战加上了最好的注脚。然而，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杜鲁门讲话重新界定了“美国国家安全”这一概念的基本范畴。在回忆录中，杜鲁门本人这样概括说：“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安全有关。”^① 这显然是将美国国家安全无限扩大化和绝对化的政策宣言，并且这种扩大化了的“绝对安全”理念一直左右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直至今天。

^①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19页。

正是从全新的国家安全理念出发，杜鲁门政府调整了其内部的决策机构，建立起政治、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文化、情报一体的国家安全机制。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杜鲁门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根据该法，杜鲁门创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由总统任主席，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内阁各部部长作为主要成员，对外交、安全、国防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政策进行广泛的部际协调与合作，其主要目的是协调美国外交和军事承诺与需要，最大限度地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同时，这个重要的立法也促生了新的国家安全机制：国防部、中央情报局以及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①自此以后，这套国家安全机制就成为从规范与制定到实施与监督美国冷战战略的保障。

与国内机构建设相适应，杜鲁门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开始向全面冷战的确定方向演变。早在1948年8月，杜鲁门政府就用NSC20号系列文件确定了美国的全面冷战战略（一般认为NSC68号文件是美国全面冷战战略形成的标志）。NSC20号系列文件在下述几个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首先，它界定的美苏冲突的根本特征是持久性与不可避免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苏联的目标几乎是不会改变的。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总体而言，苏联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本质决定了一切，即永恒的敌对和冲突。这种敌对和冲突有时在和

^① 详见美国国务院撰写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史（1947—1997）》（*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97*），引自<http://www.whitehouse.gov/nsc/history.html>。

平的框架下发生，有时在战争的合法框架下进行”。^① 其次，它确定美国对苏联关系的基本目标有两个：一是缩小苏联力量的影响，使它不能再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二是“使在俄罗斯执掌政权的政府对其奉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有个根本的转变”^②。最后，文件明确为了反击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美国应“使用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把苏联的力量和影响减少到一定限度，使它再也不能对和平、国家独立和国际大家庭的稳定构成威胁，要“鼓励那些有助于修正当前苏联行为的俄国人情绪的增长”，要“加强苏联以外国家的亲美导向；并帮助这些国家增强经济和政治稳定以及军事能力，使之有能力、有意愿对美国的安全做出重要贡献”^③。这已经是非常全面而具体的官方冷战政策文件，但一直以来却被冷战史研究者所忽略。

冷战开始后的美国究竟以何种方式来实现其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是一个涉及冷战起源、性质以及能否对冷战进行合理分析和预测的重大问题。传统的冷战史研究一般将

①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Russia,” NSC20/1, Aug. 18, 1948, PD00084, pp. 2–3, 数据库：*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ereinafter cited as DNSA),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

②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Russia,” NSC20/1, Aug. 18, 1948, PD00084, p. 5, DNSA.

③ “U. 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 S. Security,” NSC20/4, Nov. 23, 1948, PD00025, pp. 10–11, DNSA.

注意力集中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以及局部的代理人战争上，在相当长时期内，美苏关系的分合、联盟力量的重组似乎是国际关系的主题，许多重要的冷战元素（和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都被这个大的主题所掩盖。不论是冷战研究的正统学派、修正学派还是后修正学派，无一例外地都将冷战理解为一种亚战争状态或硬权力斗争过程。说到底，认为只有在军事力量层面决出胜负才代表着冷战终结的传统观念是西方学者没有预测到冷战结束的根本原因。

冷战结束之初，许多西方外交史学术刊物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冷战研究的论文，对为什么没有预见到冷战会终结进行反思。与此同时，美国和原苏东国家的外交文件不断解密或曝光，“即便不能说是泛滥，也可说是积水成河了”^①，遂由此引发了新冷战史研究的风潮。

有关“新冷战史”研究的成果很多，这里不想一一赘述。然而“新冷战史学”对传统冷战史学的一个重要突破是，承认冷战是由多元要素（多样化的力量、多样化的手段）组成的，也许苏东国家不期而解体的原因就要从这些要素中寻找。从美国冷战决策的角度来说，自杜鲁门外交咨文重新界定美国“国家安全”那一刻起，美国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不计一切手段，在所有领域同苏联进行冷战较量。这一点在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制定的几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中就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当我们回头重新解读冷战初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文件时就会发现，冷战之全面多元特征早已显露端倪。上述 NSC20 号文

^①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VII.

件在评述“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的性质时就提到，苏联为达到威胁美国的目的，正“向所有抵制共产主义企图的国家发动政治、经济和心理战”^①。因此，美国只能动用一切手段，相应地在这些方面迎接苏联的挑战。事实上，在美国冷战决策者的心目中，政治、经济、心理、文化、技术以及其他一切非军事手段即便不是冷战的主体也是同军事斗争同样重要的冷战武器。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被学界公认为冷战形成标志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NSC68）。NSC68 号文件颁布时，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即苏联于 1949 年爆炸成功第一枚核装置，由此影响到了美苏的战略力量对比。许多学者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认可新形势下出台的 NSC68 号文件才是冷战最终形成的标志。实际上，除了“核武器”这一新因素外，NSC68 号文件所显示的冷战核心思想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改变，文件中也非常明确地承认：“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20/4 号文件（1948 年 11 月 23 日）中概括提出的目标……和本文陈述的目标完全一致，并且它们仍然有效。”^② 这里暂且抛开这种学术争论不谈，单就 NSC68 号文件反映出的美国冷战决策而言，它在双方都已经“有核”的时代所规划出来的美国冷

① “U. 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 S. Security,” NSC20/4, Nov. 23, 1948, PD00025, pp. 10–11, DNSA.

②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NSC 68, April 14, 1950, 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c-hst/nsc-68-4.htm>.

战战略不仅没有修改，反而加深了 NSC20 号系列文件中体现出来的冷战观念。换句话说，NSC68 号文件进一步认同：“对于自由社会来说，诉诸战争不仅是最后的选择，而且它并不能彻底结束在思想领域里的根本冲突。奴隶的思想只有靠频繁而又持续地展示自由思想的优越性，才能得以克服。”^①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这样概括说：“苏联威胁之所以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是因为它具有无所不包的（all-inclusiveness）特征。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为其扩张武器服务。贸易、经济发展、军事力量、艺术、科学、教育、整个人类的思想——都被缚在其扩张的战车上。”^② 反言之，美国政府针对苏联的冷战战略也必然是“无所不包”的。因此，从本质上说，美国决策者设计的冷战既是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也是政治和心理上的；既是外交谈判与经济援助政策，也是国家威信度与制度号召力的竞争。一言以蔽之，“新冷战史”研究视角下的冷战应当是一种总体冷战（Total Cold War）。

—

这样一种总体冷战的许多方面和环节在近四十年的传统冷战史研究中隐而不彰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①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NSC 68.

^② Dwight Eisenhower, “State of the Union, 1958,” available at <http://www.ukans.edu/carrie/docs/texts/dde1958.htm>.

就是第一手文献资料的缺乏。“新冷战史”研究的开山人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和许多研究者都承认，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冷战史研究思潮与多国资料文献的公开有关。美国最为著名的冷战史研究机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①（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正致力于汇总、编辑和解读来自各国的冷战文献资料，并且已经形成一个联结各国冷战史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学术平台。

现代信息社会同样给予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以前所未有的机遇，使其可以突破地域、成本、时间的限制，取得足堪与国外史学工作者相媲美的研究基础，从而改变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尤其是美国外交政策史研究蛰伏于他人二手文字之下的历史与现状。本论文集使用的文献资料有相当部分来源于网上的免费资源，除此以外，缩微胶片和网络数据库的应用弥补了更多的资源缺憾。

国内研究美国内外政策史的学者一般都熟知并广泛应用的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FRUS 是美国国务院依据外交文件 30 年解密制度将已经解密的有关重要美国内外决策和外交活动的历史记录编辑出版的官方历史文件集。FRUS 收录的文件始于 1861 年林肯政府时期，最新出版的卷册已经到了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时期（1976 年），共 350 个独立卷。尽管 FRUS 文件集的出现免去了早期学者去美国国会图书馆或各总统图书馆搜寻、复印和抄录资料的苦差，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不啻于一种学术上的福

^① 中心网站和收入的文献档案详见 <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

音，但对中国学者来说，使用印刷出版的 FRUS 仍然是太过昂贵了。大约六七年以前，国内仅南京霍普金斯中心和北京外交学院收藏有部分 FRUS 卷册，其余学术单位都只是零星购入，学者仍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于一种缺少资料的困境。实际上，为便于历史学家使用，美国国务院早已开始用官方网站^①定期发布近二十年解密的 FRUS，目前该网站收录的 FRUS 有杜鲁门政府时期 1 卷；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 3 卷；肯尼迪政府时期 21 卷；约翰逊政府时期 33 卷；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 8 卷。这些对研究战后美国外交史非常实用。然而，仍有 1861 年以来的大量 FRUS 没有在国务院的官方网站公布，这部分文件解密相对较早，国内各研究机构也少有收藏。幸运的是，近年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开始系统地将 1861 年以来的 FRUS 整理上网，为美国外交史学者提供了又一笔珍贵的文献宝藏。^② 目前，威斯康星大学网站的 FRUS 已经有 218 卷，并提供图像文件和文本文件两种浏览方式。

然而，FRUS 固然有其宝贵之处，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其一，作为一种出版物，它的容量毕竟是有限的，难以满足数量众多的学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的要求。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就出现了一种“瓜分”现象。某一时期 FRUS 刚刚出版或上网，立刻就有学者写出相关文章来，反应不及的学者只好望洋兴叹。其二，FRUS 是由美国官方历史学家编撰成集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官方色彩，在材料的选择和编排方面受政府的影

① 详见 <http://www.state.gov/pa/ho/frus>.

② 详见 <http://digicoll.library.wisc.edu/FRUS/About.shtml>.

响。1990 年就曾发生负责编撰 FRUS 的外交史学家（沃伦·科恩）因不满政府隐瞒历史事实愤而辞职的事件。FRUS 的局限性可见一斑。

1966 年，为确保普通公民的知情权，美国国会通过一个“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FOIA 赋予每一个美国公民向政府要求解密政府文件的权利，除了九项例外，任何一个联邦政府职能部门都不得拒绝公开公民要求解密的文件。这一法律的有效性在尼克松“水门事件”发生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因此 20 世纪 70 年代曾出现一个公开政府外交文件的高潮。FOIA 的直接受益者是历史学家。自此以后，美国各学术团体、研究单位和一些文化公司开始依据 FOIA，使大量尘封的文件得到解密。实际上，相当数量的解密文件早已超出外交文件 30 年解密的限制，一些近年封存的“最高机密”（Top Secret）文件也得以公之于众。

最初得以解密的文件一般是以缩微胶片形式出现的，便于保存和复制，国内目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大学都存有缩微胶片，如国家图书馆所藏“国家安全委员会 1947—1977”及其增补卷（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77 and supplements）是极具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

另外一种使用更为方便且容量丰富的文件形式是网络数据库。美国 Thomson Gale 公司开发的数据库“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简称 DDRS），共收入来自美国政府各相关决策机构（中央情报局、白宫、国务院等）的各种解密文件 75000 份，超过 50 万页。东北师范大学是国内第一家购入此数据库的学术单位，该数据库目前在国内的应用已经相当普遍；而另一家美国公司 ProQuest 公司

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外交史学家、外交文献学家共同开发的数据库“数字国家安全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简称 DNSA），被誉为“除美国政府之外，当代国家安全解密信息的最大收集库”。其特点是文件分专题归类，现已有 26 个专题的完整收藏，包括从杜鲁门政府到克林顿政府几乎所有已经解密的总统指令文件（Presidential Directive）数十万份，目前国内尚无人使用。DDRS 和 DNSA 联袂使用及其与各种文本和胶片版本文献之间的错简、补阙与对校，遂成就了本书文献学研究方面的一大突破，也使书中各论题的研究都能够言之有物、文出有源，具备了深厚的资料基础。

三

本论文集收入 5 个单元 15 篇文章，从军事、政治、经济、心理宣传等各个角度探讨了美国冷战战略与美国国家安全的深层关系，从而延展了美国国家安全研究的范畴与向度，有助于冷战史研究的丰富与完善。

研究单元一，中国战略核武器发展与美国国家安全：冷战时期，尽管中国不是美国最为强大的对手，但中国的对美外交取向、中国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中国战略核武器发展都使美国将对华决策放在其国家安全决策的重心位置，将中国的决策意图和行动方式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研究的重中之重。《试论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评估与对策（1961—1964）》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对策调整（1964—1968）》两篇文章追踪了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两

届政府对中国核武器发展研制进行分析研究，进而制定相应决策的历史过程；《美国早期 ABM 部署计划与中国战略核导弹发展》对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研制和早期部署的历史进行了考察，特别是纠正了学界过去认为美国 ABM 部署是针对苏联的错误，指出 ABM 从一开始就是针对中国战略核导弹而设置的。

研究单元二，军事战略部署与美国国家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是一个战略武器平衡的恐怖和平时代，其支点十分脆弱。尽管美国是一个战略武器大国，其遭遇核打击和生化武器袭击的危险系数却是最高的，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因此美国政府一向把自身的安全评估与战略武库发展联系起来：安全评估的危险系数越高，战略武库越庞大；而战略武库越庞大，实际上危险系数会相应攀高，由此落入一个“安全困境”中。《美国战略进攻导弹发展计划与国家安全政策研究》、《美国放弃生化武器研制决策评析》则追述了尼克松政府之前美国生化武器计划的决策、内容及主要问题，以及尼克松政府放弃生化武器研制的种种政策考虑。而无论是发展、研制、部署还是放弃，实际上都与一个关键词相链接，即“美国国家安全”。《冷战与美国军事利用南极政策（1945—1958）》一文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论及了美国在战后对南极进行的几次大规模军事探险、考察行动，以及美国军事利用南极政策的出台、发展及其最后破产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在冷战时期，美国把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视为与美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冷战思维模式。

研究单元三，经济冷战战略与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冷战研究当属目前冷战史研究的热点。在冷战大背景下，美元和贸易都被用作美国政府实现其对外政策，保障其国家安全的工具。

《试析肯尼迪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和《论尼克松政府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三篇文章对连续三届美国政府的经济冷战战略进行了探讨，试图揭示经济冷战的策略方针及其发展演变的特征。特别是对约翰逊政府和尼克松政府的东西方贸易政策和对华贸易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进行了细致的论证和分析，其主要引证文件也多是近几年来美国政府的最新解密文件。

研究单元四，冷战心理宣传战略与美国国家安全：在冷战结束后人们可以以一种超脱目光看待历史的今天，心理宣传战略在冷战中的作用日益彰显。这一研究单元的三篇文章旨在说明，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刻意精心、深谋远虑地制定了详细的冷战心理宣传战略。在传统的冷战史研究中，很少有人关注美国政府发动的规模庞大、范围广泛的心理战。即便有学者目力及于此，也会把冷战环境中的宣传战和心理战视为美国针对苏联东欧国家，为破除铁幕而发动的攻势。然而，后冷战时代解密的文件恰恰打破了这一观念。文件显示，美国的心理战略不只是针对苏东共产主义国家，针对走中间路线的中东国家，更有相当部分是针对美国的战略盟国和所谓的“自由国家”的，其目的无非是通过巩固内部、稳定中间、争取外围来最大限度地确保美国国家安全，赢得冷战。此外，这种争夺人心导向的战争模式亦绝非美苏斗争的次要方面，而是冷战的主战场。美国在冷战中发动的心理战体现在各个领域、出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处处体现出美国为保障“国家安全”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政策实质。《论战后初期美国在日本进行的心理战（1945—1960）》、《战后初期美国在伊朗开展的电影冷战宣传战略（1945—1953）》和《“争夺心灵和思

想”——杜鲁门政府如何展开对“苏东国家”的冷战宣传》这组文章正是对美国这种心理冷战设计的公示与曝光。

研究单元五，地区安全战略与美国国家安全：自建国以来，美国外交就一直在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离岸平衡与积极干预之间徘徊。二战后美国确立全球主义外交取向的结果是在全球处处承诺、处处插手，而现实却是，即如朝鲜、越南或今天伊拉克这样的小区域都会使美国陷足其中，无暇他顾。这使美国决策者出于现实安全考虑非常倚重地区安全体制和与盟国的协作。《太平洋公约组织的策划与破产》一文考察了美国在欧洲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后，又试图筹建亚太集体安全体制，及其终因种种现实条件制约而胎死腹中的历史经过，这一段湮没的历史真实至今无人提及。《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非洲之角政策》、《大西洋联盟的稳定与美国对法国经济政策的调整（1958—1969）》则从区域安全的视角出发，对美国全球冷战安全战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索。